

第一辑

现代女性文学管窥

13

论吕碧城诗歌中的“怨”和“悟”

吕碧城一向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近年来学界对其词作研究颇多。然除此之外，吕碧城一生还创作有近百首诗歌，内容极为丰富。作为一位生活于晚清至民初这一“过渡时代”的传奇女性，吕碧城思想超前，特立独行，但其一生却执着于旧体诗词创作，充分显示出“过渡时代”闺阁才女的生存矛盾和文化悖论。就其诗歌内容而言，主要涉及闺怨、平权、参佛等三个方面：闺怨诗多作于早期，主要表现吕碧城客居外家时的闺怨愁思，伤感中透露出“不因清苦减芬芳”的个人气节；平权诗主要表现吕碧城男女平权的思想，表现了“深闺有愿作新民”的女性独立愿望；参佛诗主要表现吕碧城晚年主张和平护生的思想，传递了“我到人间只此回”的生命了悟。这些诗歌作品不仅表现出吕碧城各个时期的心理状况及其变化，而且可以从中观照其人生和思想观念的转圜及其成因。其诗歌作品从女性生存之“怨”的抒发，到谋求男女平等、寻求女性独立意识的表达，再到参透万物事象、达成人生之“悟”的写作的流变过程，既有着内在与外在的原因促使、偶然与必然的机缘造就，也是诗人对自我生命走向的自觉取舍，是其对自我主体形象的主动性建构。

一

吕碧城的诗歌作品首先是其个人生存状况和情感历程的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多舛的个人际遇和家庭变故造就了吕碧城的诗歌创作，是剧变的时代成就了吕碧城的文学才华。吕碧城（1883—1943），安徽旌德人，生于山西太

原，原名贤锡，字遁天，号明因，后改为圣因，晚年号宝莲，法号曼智。吕碧城出生于一个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官宦人家。父亲吕凤歧，为同治庚午举人，光绪丁丑进士。历任国史馆协修、玉蝶馆纂修、山西学政。他一生从政从学，藏书甚丰。母亲严士瑜，为严琴堂次女、吕凤歧继室，生四女：吕惠如、吕美荪、吕碧城、吕坤秀，吕碧城排行老三。吕碧城自小聪慧过人，颇得父亲喜爱，受到良好教育，又有母亲严氏亲为课读，学有所成。这一切自然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家学和文学基础。

但天有不测风云，1895年吕碧城13岁时，父亲吕凤歧因病过世。可以说，这是改变吕碧城命运并深深影响其此后人生道路的一次重大变故。父亲去世后不久，族人争相霸占家产，甚至将吕碧城母女幽禁。年幼的吕碧城不堪欺凌，奋起反击，四处写信告援，内中包括时任高官的父亲的生前旧好，最终使得母亲脱险。但这件事情却使吕碧城九岁时即定亲的“夫家”起了戒心，以家庭变故为由趁机提出退婚。彼时虽则女性订婚身不由己，但被退婚却被视作奇耻大辱，高才奇情如吕碧城概莫能外，甚至退婚事件对她造成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灵创伤。第二年，吕碧城母亲严氏因生活无着，放弃六安城南新宅，带着吕碧城姐妹投奔来安娘家。当时吕碧城的舅父严朗轩在塘沽任盐课司大使，吕碧城奉母之命前往投靠，得到较好的教育。1904年，吕碧城欲前往天津探访女学，遭到舅舅骂阻，激愤之下离家出走。幸因才学被《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赏识，得以任编辑之职，自此吕碧城开始走上自食其力的独立道路。在《大公报》任职期间，吕碧城终于得以将自己的观点和呼喊告之世人，将深埋于内心的声音吐露给世人，从而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反思。

1904年5月11日，《大公报》刊登吕碧城《舟过渤海偶成》七绝一首。诗词刊发后，中外名流投诗词鸣钦佩者纷纷不绝，诸如署名罗刹庵主、铁华馆主、寿椿庐主、摩兜坚室、姜庵词人等，皆有诗词投赠^①。《大公报》带给吕碧城名誉、地位、朋友，甚至一时之间，“绛帷独拥人争羨，到处咸推吕碧城”。1904年5月20日至21日，《大公报》连载吕碧城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引发热议。当时吕碧城希望办一所女子学校，于是在《大公报》上发表此文，希望借

① 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0页。

助言论进行宣扬。吕碧城的这一愿望很快得到官绅梁士诒、傅增湘、方药雨、英敛之、徐星叔等人的积极赞同，并为之筹款兴办^①。于是，兴办女学的愿望得以顺利达成，吕碧城向实现男女平权的理想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12年，北洋女学停办，吕碧城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机要秘书。后来因为不满帝制，吕碧城毅然辞职，南下上海进修英文，并游历了庐山、西湖等名胜。其间，吕碧城与西商角逐交易，数年间获利颇丰。1918年赴美留学，1922年归国，1926年再度赴美。之后吕碧城较长时间旅居欧美各国，精研佛典，宣扬戒杀护生思想。在此期间，吕碧城瞩目美景，结交名流，写下大量诗词作品，这个时期的诗歌中已经渐渐显示出其皈依佛教的倾向，并于1930年前后开始真正信佛。1933年冬，吕碧城由瑞士回国，后寓居香港山光道27号，偶赴国外。1943年1月24日，吕碧城在香港东莲觉苑病逝。留下“护首探花亦可哀，平生功绩忍重埋。匆匆论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的辞世吟唱。

吕碧城的诗歌不仅写尽其人生遭际和时代剧变，而且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那个尽人仿效“英雄”的时代，她拒绝模仿男性口吻，主张女性本色创作，强调真性情写作。而女性文人天生的所谓“女子气”，恰恰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呈现出强烈的女性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意识是20世纪初期处于动荡和变革社会中的女性寻求解放、谋求独立的愿望的体现，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直至21世纪初期的今天，再次强调的性别差异性的直接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吕碧城女性解放眼界之高远和思想之超前。

二

吕碧城的闺怨诗多为慨叹世态炎凉之作，伤感中透露出“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的气节。从幼年时优裕家庭中备受娇宠的女儿，到少年时寄人篱下的外戚，再到青年时愤然离家出走的时代女性，这其中所经历的世

^① 刘纳编著：《吕碧城评传·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态炎凉及吕碧城的心理变化从她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例如《感怀二首》^①，此诗为吕碧城少女时寄居天津塘沽舅舅家时感旧伤怀之作。其一，“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荆枝”喻指兄弟骨肉，“椿树”代指父亲，“两凋伤”指吕碧城幼年时，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先后去世，父亲因不堪丧子之痛亦因病去世。“幽兰”指诗人自己。全诗字里行间散发出丝丝凄凉之意，同时，读者也可以感受到作者傲霜独立的倔强和坚毅。其二，“燕子飘零桂栋摧，乌门衣巷剧堪哀。登临诗望乡关道，一片斜阳惨不开”。“燕子飘零”指父亲去世后，寄身来安外祖父家。“桂栋摧”指父亲去世后，族人争夺财产，刚落成的新宅被恶族夺取。“乌衣门巷”暗指吕碧城家道中落。前两句回忆并感叹身世变迁和世情险恶，后两句流露出寄人篱下的落寞之情，怀念故乡，怀念幼时开明、宽松、优裕的家庭环境，怀念幼时无忧无虑的生活。今昔对比，如今却只能遥望家乡，且是“一片斜阳惨不开”，读来令人动容。

又如《老马》：“盐车独困感难禁，齿长空怜岁月侵。石径行来蹄响暗，沙滩眠罢水痕深。自知谁市千金骨，终觉难消万里心。回忆一鞭红雨外，骄嘶直入杏花阴。”前两句写良驹被贱役所困而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看着岁月的流逝，喻指贤才被荒废，不被重用。“自知谁市千金骨，终觉难消万里心”，指明知道没有人会来赏识我，但我自己仍怀有志存万里之心。全诗虽然咏叹老马，感叹良驹被现实所困而不能实现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但诗人不仅仅感叹于此，相反，描写老马在困境中仍然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之心。全诗托老马言己志，表达了诗人虽暂处困境，却不消沉认命，而是敢于和命运抗争，保有一颗坚毅进取之心。

再如《天风》：“天风鸾鹤怨高寒，玉宇幽居亦大难。红粉成灰犹有迹，琼浆回味只余酸。早知弱水为天堑，终见灵衣拂月坛。悔过蟠桃花下路，无端瑶瑟动哀顽。”吕碧城早年多有毁纲裂常之论，于是频遭顽固守旧人士抨击，甚至女界的同伴好友也反目成仇。严复在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曾将个中原因说得极为透彻：“此缘其得名太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者大以为然，

① 李保民：《一抹春痕梦里收：吕碧城诗词注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之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若此。”面对这般世态炎凉、讥言讽语，吕碧城虽然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终将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痕迹，却无法掩饰也不愿掩饰内心的孤独与情感上的凄凉。故此，吕碧城在诗歌创作中并不回避自己柔弱的一面，早年客居外家的尴尬境地，走出家门向封建礼教挑战时遭遇的抨击和责骂，甚至是友人的反目成仇，这些都可以在吕碧城的诗歌中看到。但吕碧城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将自己的幽怨与愤懑正常地发泄出来后，却不止步于自怨自艾，而是坚定地保有高远超拔、理智坚韧的心态，这不仅难能可贵，还需要极大的内心力量的支撑。

三

吕碧城的平权诗表现了“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的独立愿望。走出深闺，寻求独立，争取男女平权，吕碧城可算是近代中国女性中较早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独立思想影响者之一，她的许多作品中渗透出呼吁反抗、争取独立的精神。如《书怀》：“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眼看沧海竟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频。”一句采用沧海桑田的典故，表达世事瞬息万变；“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一句表现作者期待破除旧弊，即使是深闺中的女儿身，也期待能够有所作为；“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指作者极其渴望男女平等，希望全天下被黑暗社会现实压制的人都能“作新民”。在旧时代行将灭亡之前，在充满腥风血雨的黑暗长夜里，吕碧城一往无前、无所畏惧地争取平权和独立；而且诗人业已意识到她的理想远非个人力量所能及，必须唤起全天下的民众，期冀大家共同反抗专制和压迫。

再如《写怀三首》：“大千苦恼叹红颜，幽锁终身等白鹇。安得手提三尺剑，亲为同类斩重关。”“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无量沙河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苦海起离渐有期，亚东风气已潜移。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蛾眉独立时。”三首抒怀诗表达了吕碧城对女性受压制状况的不满与抗

争。白居易有诗云：“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吕碧城对此更是有亲身体会：幼年时遭遇父亲去世的家庭变故而饱尝族人的欺凌，青年时欲探寻女学而遭遇舅舅骂阻，这些困顿没有使她却步，反而激起她更为强烈的反抗，从而毅然出走，但这些经历却使吕碧城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重重压抑和不公。这三首绝句，语调铿锵，气势磅礴，表现了吕碧城立志求平权的决心。

1904年5月25日，《大公报》载吕碧城《和梅花馆主见赠原韵》二首。其一，“风雨关山杜宇哀，神州四首尽尘埃。惊闻白祸心先碎，生作红颜志未灰。忧国漫抛儿女泪，济时端赖栋梁才。愿君手挽银河水，好把兵戈涤一回”。其二，“新诗如戛玉丁东，颁到鸿篇足启蒙。帷幄运筹劳硕划，水天擒藻见清聪。光风霁月情何旷，流水高山曲未终。霖雨苍生期早起，会看造世有英雄”。从诗中可以看出，吕碧城时刻心系国族安危，虽然世俗对女性有诸多偏见，但吕碧城依然十分热爱国家，立志挽救国族于危亡之际。“霖雨苍生期早起，会看造世有英雄。”吕碧城渴望满腹经纶的友人能够挑起安邦定国、驱逐外敌的重任，同时对友人的聪明才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①。不得不承认，《大公报》给予吕碧城一个展示自我才华和思想的平台。在《大公报》任职期间，吕碧城不仅能够向世人吐露自己的思想，更是实现了兴办女学、教育更多女子自强不息的愿望。男女平权，则是这时期吕碧城诗歌所要表达的重要思想。

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漫漫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被推翻，平民大众欢欣鼓舞，吕碧城亦赋诗抒发内心的喜悦。《民国建元喜赋一律和寒云由青岛见寄原韵》：“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天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鶚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尚在望。”诗中可以看出，吕碧城这位走在时代前列的杰出女性所彰显出的不同寻常的精神风貌。然而，吕碧城的雄心和抱负在当时黑暗的官场、尤其是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日渐显露之后根本无法实现，于是心灰意冷的她毅然辞职离京，携母去上海经商，仅两三年之间就积聚起可观的财富，并开始学习英语，为日后去国离乡、周游欧美等国家奠定基础。同时，吕碧城的平权思想也在她游历

① 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了西方各国后渐渐发生了变化。

四

吕碧城的参佛诗多为呼吁和平护生之作，表现了吕碧城晚年倾心佛典、保护动物，寻求和平的愿望。1930年春天，吕碧城正式皈依佛门，悉心从事佛典英译，佛家的戒杀护生、宣扬和平与她的追求正好契合。此外，佛教思想还为吕碧城提供了一种精神感召和理论支持，更为吕碧城提供了个人精神上得以栖息的家园。如《两渡太平洋皆逢中秋》：“不许微云滓太空，万流澎湃拥蟾宫。人天精契分明证，碧海青天又一逢。”吕碧城两次横渡太平洋皆逢中秋佳节，感慨自然颇多。这首诗中已经隐约流露出吕碧城与佛教的情缘。近代中国社会是万法解体与重组的时代，逢此“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社会人心动荡不安。吕碧城作为心系国族命运安危的近代文人，自然会思考人的生存问题。大到救国民于水火，小至个人安身立命，近代社会都需要一种精神感召和理论支持。当然，在此情形之下，学佛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对吕碧城来说，佛教更为其提供了精神上得以栖息的家园。吕碧城幼年丧父、家遭变故、寄人篱下等一系列令其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更加拉近了她与佛教的距离。佛门的空苦论与吕碧城的特殊经历相互照应并安抚了她那颗脆弱的女儿心。此外，佛教戒杀、呼吁和平的理念和吕碧城戒杀护生的理想正相契合：“人天精契分明证，碧海青天又一逢。”在吕碧城心中，上天和人之间仿佛有一种机缘感应息息相通，让她又一次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喜逢中秋，带给她无限美好的遐想。《由京师寄和廉南湖》（其一），“笛声吹破古今愁，人散残阳下庾楼。强笑每因杯在手，俊游恰见月当头。谈空色相禅初证，思入风云笔自遒。沧海成尘等闲事，看花载酒且勾留。”这首诗是诗人与名士廉泉唱和之作，诗中追忆诗人与廉泉交游时的情景。虽然诗人想到即将远行，不能再与朋友欢聚一堂，但是并无伤感之意。相反，诗人心胸豁达，从禅学中参悟色相皆空的道理，心情变得轻松欢快，自然“看花载酒且勾留”。

再如《小犬杏儿》：“依依常傍画裙旁，灯影衣香忆小窗。愁绝江南旧词

客，一犁花雨葬仙宠。”诗人得知赠与友人的爱犬因病死去，悲不自禁。回忆起小犬杏儿与自己形影不离的日子，伤感可想而知。从此诗可窥见诗人对动物的慈悲心，便不难理解诗人晚年多方奔走、宣扬戒杀护生的行为。吕碧城一生未婚，到了晚年，其孤独凄凉自不必说。但是，吕碧城并未如李清照后期一般作凄凄惨惨戚戚之语，而是主动找到佛学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依托，并将晚年大部分的精力致力于宣扬戒杀护生思想的倡导。1929年5月，吕碧城应国际保护动物会邀请，由瑞士日内瓦赴维也纳，参加万国保护动物大会，成为会议方唯一邀请出席大会的中国人^①。潜心参佛与宣扬护生使吕碧城晚年的生活变得充实而富有意义，更体现了吕碧城一贯不屈服于种种世俗观念并勇敢寻求女性独立的坚韧意志。

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中，虽然有少数走在时代前列的女子，她们极力宣扬女性独立，并身体力行，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纲常，但是，绝大多数女性还是处于重重奴役和压制之中。仅以晚清妇女论的名著《女界钟》中的论述而言，其所列举的女子应当恢复的基本权利，便包括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六项，足见与男子相比，女性在教育、社交、就业、财产以及人身与婚姻的自由度等方面，权利极度匮乏^②。清末民初，王纲解纽，百变丛生，社会处于新与旧的激烈交锋和争斗之中。此时，为谋求国家与个体的安定，男性开始尝试启蒙女性，希望女性也能参与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行动中来，共同谋取社会的安定和谐。正因为得到男性启蒙者的支持和赞助，女学才能够兴办，女性的声音也才得以让世人知晓。于是，一些女权运动的先行者极力模仿男性口吻，其实，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女性对自我主体以及性别身份的规避。

作为一个特例，在中国近代奋起抗争的时代女杰中，吕碧城一方面热血沸腾，以昂扬的斗志、坚强刚毅的内心去承受进而抵抗外部世界；另一方面，她毫不掩饰作为女子的“弱”的一面。例如，在其诗作《白秋海棠》（其二）中坦承：“泪到多时原易淡，情难勒处尚闻香。生生死死原皆幻，那有心情更艳

① 李保民：《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84页。

②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妆。”诗人述说秋海棠泪多易淡，生死皆幻，这又何尝不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写照？诗人将女性个性和情感上脆弱的一面借秋海棠如实道来。综观吕碧城的一生，从“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到“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再到“沧海成尘等闲事，看花载酒且勾留”，无论是宣扬女权、兴办女学，还是研译经典、宣扬戒杀护生，她始终怀有一颗忧国之心和为天下女性同胞争取平权谋求解放的志气。吕碧城在《谋创中国保护动物会缘起》中写道：“吾生有涯，世变无极，唯以继续之生命，争此最后之文明。庄严净土，未必不现于人间。虽目睹无期，而精神不死，一息尚存，此志罔替。吾言息壤，天日鉴之。”^①这段铿锵有力的文字鲜明地表达了她一生的信仰。

人们在追怀吕碧城超凡脱俗的一生时，往往对其最后的遁入空门充满遗憾，甚至认为其一生孜孜以求之男女平权大业之未成，原因就在于其晚年转向佛学。吕碧城风华绝代，才冠群英，一连串的桂冠都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近代女词人第一人”、“中国第一位女编辑”、“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位女校长”、“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提出女性教育思想者”、“第一位系统进行佛经翻译的中国女性”、“第一位在世界动物大会上进行废屠演讲的中国女性”等等。事实上，后人不必苛求于那个时代女性的完美，吕碧城恰恰以她一生不断的兴趣和志业的转换验证了她对生命本真的追求。正如她在《写怀三首》中所咏：“大千苦恼叹红颜”，她其实早已经意识到女性和时代的局限，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笔为刃，“亲为同类斩重关”，她切实利用她在《大公报》的有利位置，向社会发出了男女平权的吁告。但几乎就在同时，她也清醒地意识到女性解放的困境与艰难，所遭受的排挤和讥讽，故而发出“无量沙河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②的期待。世间一切苦厄她早已尝尽并勘破，只期望早日放下，早日解脱和皈依。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她期待已久，也修行已久，而她之前所做的一切恰恰是为了这个万千女性翘首以待的目的：“苦海超离渐有期，亚东风气已潜移。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娥眉独立时。”时至今日，当世界范围的女性大部已经实现自我的独立之时，人们又怎么能不缅怀吕碧城这个20世纪初年的女性先驱呢？缅怀她惊人的胆识和超人的智慧？吕

^① 吕碧城：《欧美之光》，上海国光印书局1931年版，第120页。

碧城的诗歌再现了她思想的轨迹，也见证了她人生的历程。吕碧城的超拔之处在于，她所做的一切取舍并不仅仅缘于时代的沉浮，亦不为周边人事的牵系变动，当然更不是个人的任性而为，这是在她充分了悟世态和人生真谛的基础上所作的主动决断。终其一生，她以强劲的姿态选择个人命运，直至最后的生命归宿。正是通过这样独特的形式，她完成了对个体尊严与自由的诠释和实践，也藉此完成了对自我主体的主动性建构。

萧红作品中的生存场景隐喻及其意义

与整个现代文学的作家比较，萧红是如此的特异；与现代文学的众多女性作家比较，萧红还是一个异数。这特异到底在什么地方？她的生命流程、她的心路历程、她的价值决断、她的审美方式、她的创作个性、她的文体特征都是一个异数，虽然文学史家也曾给她冠以“左翼作家”、“东北流亡作家”的称号，但显然她的作品独立于这些团体或流派所代表的艺术范式之外。许多研究者也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探及其思想的某一层面，越来越多地为读者呈现一个立体存在的萧红。本文提出“生存场景”的概念，企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萧红的作品，发现某些未被言说的真实，从而在此基础上探究场景隐喻在作家创作中的普遍意义。

一

“场景”一词在《现代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指戏剧、电影等艺术作品中的场面。在《文艺理论词典》中解释为：也叫场面。是人物与人物之间在一定的时间、地点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画面。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它甚至不如关于“典型环境”的介绍更为清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的，形成其性格并促使其行动的特定环境。典型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两种。社会环境指一定社会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及其发展趋势，民族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环境指人物活动的地域、气候、景物等。典型环境便是典型人物生活、活动的一切外在条件的总和。似乎也

没有必要为此再造一个新的词语,本文更愿意赋予这里所使用的“场景”一词以较为完备和准确的解释,它指呈现在作品中提供人物生存活动时空的特定景观,包括地域、气候、景致等自然因素,也包括文化、道德、伦理等社会内涵。地域性是最明显的特点,但这地域必须是在气候、文化等因素笼罩或浸染下的地域。

在这样的界定基础上,萧红的作品就其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场景的故事,她写作主题转换实际上是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的转移,最终仍然是那片可亲又可憎的故土。从萧红作品的题名就可以毫不费劲地看出场景设置在其作品中的自觉与普遍,《生死场》中在自然暴君的双腿下,蠕动着男人与女人们生与死的场景,土地与麦田、河沿与高粱地;《呼兰河传》中凝结着愚昧与忧伤、飘零着寂寞与失落的生存场景,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小城三月》里飘着飞絮、有着短命的春天的小城;《后花园》里有着童稚的无邪与成人的冷酷的成长天地;还有《商市街》《北中国》《马房之夜》等,这里面既有着明显的地域性,也有着鲜明的季节性。还有一些作品则有着与季节明显相关的场景意识,如《春意挂上了树梢》《飞雪》《他的上唇挂霜了》《又是冬天》《又是春天》等。就在几乎所有的上述作品中,都包含着社会文化场景的内涵,如《呼兰河传》中的戏台、庙宇、大泥坑、扎彩铺、跳大神、放河灯、东大桥等都是隐喻着多重意味的传统文化生活场景。

同时,为了对这些场景进行具体分析时的方便,本文又可以将其作品中的场景分为模糊场景和细节场景,模糊场景是指较宏观的包含以上诸因素的叙述所展开的整体场景,细节场景则是指一个一个的故事或者说叙述逐渐展开的具体的个别场景,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个别生存场景组成了那个模糊的整体场景,从而隐喻着人类生存和女性生存的深层意蕴,在这个意义上才有可能认知萧红创作的独特意义。

二

“严寒”即使不是萧红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给阅读者留下最

深刻和恐怖印象的生存体验。她的家乡在中国的最东最北部，一年之中有四个月飘着白雪——那并不是浪漫的事。当她在哈尔滨流浪时，不得不用夏季穿的透孔的鞋子去接触着雪地，“那夜寒风逼着我非常严厉，眼泪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门扇上起着小小的粘结”，“甚至于我想到了狗睡觉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温暖”。^①多年之后，当她已不再流浪，严寒所留给她的记忆仍是如此的触目惊心，“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服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冻丢了。”^②众所周知，梦与潜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梦的材料常常是那些在精神上具有重大意义、给做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而在所有材料和来源中，最为作者所强调的是做梦者的童年创伤经验。对于萧红而言，流浪时的创伤性经历已深深烙进她的记忆之中，作此精神分析应该是完全合理的，但它的意义绝不止于此。

漫长的严寒中不是没有期盼，这期盼是热切而痛苦的，而作为生存场景的春天是这样来临的：

在我的家乡那里，春天是快的。五天不出屋，树发芽了，再过五天不看树，树长叶了，再过五天，这树就好象绿得使人不认识它了。使人想，这棵树，就是前天的那棵树吗？自己回答自己：当然是的。春天就象跑的那么快。好象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跑到这个地方，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呵。”而后很快地就跑过去了。^③

春天的命运就是这样短。中国尤其是北国的女性对于这“春”不知怀着多少意义，“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当大街小巷飘飞着杨花的时候，对于春

① 《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3 页。

② 同上书，第 1000 页。

③ 《萧红文集》（1），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92—493 页。

天的期待也达到了巅峰，“春来了，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个大暴动，今天夜里就要举行，人人带着犯罪的心情，想参加到解放的尝试……春吹到每个人的心坎，带着呼唤，带着蛊惑……”^①经过这一夜的疯狂，短命的春天就过去了。

“河沿”是萧红作品《生死场》中得到表现的另一个重要场景，那是一个“多事之地”，“不是好人去的地方”，河沿上唱着一支小曲，“昨晨落着毛毛雨，……小姑娘，披蓑衣……小姑娘，……去打鱼”，咏唱者是一个带有挑逗性的男人，而在河沿的生存场景中被诱惑的是女人，这就是她们屈辱与疯狂的短暂的所谓“春天”。“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没有想到，我也不愿那样，我知道给男人做老婆是坏事，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把我拉到马房里，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②这里呈现的是上一辈女性的生存命运，到了金枝又怎么样呢？她听着鞭子响、口哨响，去河沿约会她的心上人了。然而，“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当他们受着惊扰了：“发育完全的青年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去。”^③

当女性的爱情在“河沿”上遭到毁灭性的杀戮时，在另一生存场景“戏台”下则进行着温文尔雅的将女性作为商品的洽谈与交换。《呼兰河传》中搭起的“野台子戏”的戏台不只是唱戏用，它的多功能性简直令人惊叹。东北有童谣：

拉大锯，扯大锯，姥爷门口唱大戏。接姑娘，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华北地区也流传着类似的一则童谣：

小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别人的闺女都来了，俺的闺女咋不来？

① 《萧红全集》（1），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70页。

② 同上书，第237页。

③ 同上书，第236页。

前者有传统的热闹，后者则充溢着民族的悲凉。无论它的情绪如何，“戏台”同“女儿们”的命运有剥拆不开的关系。所谓的看戏极具虚拟性，因为既没有现代的音响设备，人又众多杂乱，“听是什么也听不见的，看也很难看到什么，无论看不看，戏台子底下不能不来”。首先是大批的“相亲”活动在戏台下进行，“也有只通知男子而不通知女家的，这叫做‘偷看’，这样的看法，成与不成，没有关系，比较地自由，反正那家的姑娘也不知道”。其次是“指腹为婚”的仪式在此时举行，也有喝酒作乐的随便的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人家。“假若女家穷了，那还好办，若实在不娶，她也没有办法。若是男家穷了，男家就一定要娶，若一定不让娶，这姑娘的名誉就很坏， she 就把谁家‘妨’穷了，又不嫁了。”^①最后不得不嫁过去，反遭百般侮辱，丈夫因此也不喜欢她了，公公婆婆也虐待她，于是往往演出悲剧来，跳井的跳井，上吊的上吊。

在《呼兰河传》所构织的地理生存场景中，除了河沿、戏台外，还有庙宇，“娘娘庙”与“老爷庙”的景观绝然不同，娘娘们都塑得温顺，老爷则凶猛，“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磕了亦不后悔”。于是温顺就成为老实好欺侮，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理由。这些庙宇千年如一日的存在，证明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而肮脏可怖之至的“大泥坑”淹死过小猪，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里面。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却一个也没有。还有那卧在城市、村镇与荒野之边缘的“东大桥”，东大桥下发生的一些神秘或恐怖的事情，出没的一些孤魂冤鬼，在夜间叫喊或啼哭。《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被婆婆给活活打死了，她的灵魂就变成了一只大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东大桥下去哭。在中国的文学精神中，但凡化鬼化蝶都是冤情不得伸的延宕——以此来表示对那不幸者的同情，抚慰那还活在不幸中的可怜的人们。

^① 《萧红文集》(2)，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8页。

三

在文本尤其是女性的文本中，表面的故事之下掩藏着无声的故事。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使潜藏于表面叙述中的另一区域浮出，在空白之处寻找意义，在沉默之处倾听女性真实的声音。正如肖瓦尔特所说：“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女性文本的缝隙，寻找历史、人类学、心理和我们自身中被压抑的信息，从而确定未曾被言说的女性特质。”^①在对沉默者的声音的谛听与领悟中，文学批评：“不仅要命名、界定从未被命名、甚至从未被看见的事物，而且也使今天和未来的妇女来看、来表达、来界定她们自己的真实。”^②

萧红一生的不断流亡南方不能不说与这潜意识里惘惘的严寒的威胁有关，她之躲避这恐怖的为严寒所主宰的生存场景是否有着女性生存意义上更深层的原因呢？逃出了无爱的父亲的家庭，又逃出了无平等的丈夫的家，她的一生无论在生命流程还是在心路历程上都走着一条流亡之途，严寒在显在的意义上当然是自然场景，但在隐在的意义上，谁又能否认这与来自男权社会的重重威压没有一些关系呢？最终她逃出了革命与解放的大时代，以个人思考的诚实与勇气写作于香港。中国的女性独自一身生活在没有平等和关爱且充满着严寒的人生荒原之上，仿佛是在无任何遮蔽的风雨中漂泊，且漂泊得太久。中国男权社会提供给女性的生存之路太狭窄了，以至于中国的女性解放是那样让人哭笑不得，许多女性在走向自我的解放时，在能够拥有一间与某男人共享的房间时就不再去营建属于女性自我的房间。我们看到太多的女性在自由和解放的呼喊之后走入那和觉醒之前并无二致的人生囚笼，一样的忍耐，一样的争权，一样的迫害，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和苏童的《妻妾成群》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带有强烈反讽意味的主题表达。但萧红是一个异数，这在于她是清醒的时代的大勇者，她是那样决绝地逃出所有的强加的束缚和奴役。

因此，春天的短暂是这样契合那些在漫长的严寒中等待和挣扎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她们的青春、爱情的梦、幸福的幻想甚至苦涩的人生，都如这春天

①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